

西部发展与流动式人口迁移模式

——内蒙古东胜市的调查与思考

方明 孙炳耀 李汉林 王琪 王颖

一 塞上江南人

在黄沙滚滚、草木罕见的毛乌素沙漠北缘座落着一个小城——东胜市，5.4万居民，7.6平方公里市区面积，在发达地区只能是一个小镇而已，远够不上建市资格。然而在这人烟稀少的大漠里，数万人的居民点是罕的。内蒙南部伊克昭盟8.6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一个城市型居民点。

在这塞北小城，感受到一般强烈的江南气息，大小街道两旁，“温州小吃”、“上海服装店”、“正宗四川饭店”之类的招牌，比比皆是。

这新气息是远道的江南人带来的。1978年开始，几个走南闯北的浙江木工首先来到东胜。他们发现当地人特别欢迎来自南方的手工艺和家具式样，而且为人豪爽大度，买卖从不讲价。此地钱好挣，消息传回千里之外的故乡，吸引了大量手艺人和小商贩来这里试试运气。随着改革的深入，思想的解放，东胜市政府不断放宽政策，敞开大门，在户口、工商管理、生活和场地设施上不断创造条件，帮助客人站稳脚跟。由外省、市来东胜的个体户日益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到1987年7月，在市区经营的外来个体户达355户，占市区个体户总数的35%；从业人数495人，占33%；资金34万元，占55%；营业额87万元，占68%。在资金营业额上，外来户反客为主，占了大头。

这些外来户或者挂牌开店，固定服务，或者走街串巷，流动揽活，上门服务，经营方式多样，范围很广，其中又以商业、饮食和服务业为主。355户中，商业占45%，服务业27%，饮食业19%，手工业和修业9%。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介绍，上述各业，外来户都占市区个体户的半数以上，其中修鞋、服务加工、修售眼镜、修理钟表和收音机等项目，外来户已形成“垄断”地位，均占90%以上。

这些外来人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来源集中，主要是浙江温州地区、江苏泰州地区，还有一部分来自四川。这些地区人多地少，商品经济发达，大量人口外出谋生。并形成几个明显的地缘群体。

这种地缘联系在外来人口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身在异乡，人生地不熟，地缘就成为他们结为群体，寻求相互帮助和相互保护的唯一纽带。调查中看到，他们很多人从事同一行业，甚至同一经营项目，往往在进货、价格和服务上争取共同行动。如果说传统乡土社会由于封闭而形成紧密的地缘群体，那么，东胜市外来人口由于与当地的隔膜，地缘联系就更为紧密而且更具意义了。

第二是层次较低，基本上是农村居民，来自城镇的极少。其中刚毕业的青年占了60%左右，文化水平大都较低，高中生仅占4%，初中40%，其余都是小学毕业甚至不怎么识字。

第三是流动性大。钉鞋和木、漆匠，大多是春暖花开时来，严冬降临时走，一年一度，候鸟似的流动。商业、饮食、服务业，则大多举家迁来开办夫妻店。铺面大点的，从老家或在地雇几个帮工，带几个徒弟。孩子也领来东胜上学。他们相对稳定些，往往经营了好几年，并且打算再作长留。不过问他们是否准备在此落户，均持否定态度。他们的打算是在这里好好干，挣上一笔钱，在老家盖好房子，赚下养老金，最终还是落叶归根。

二 江南人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先生产，后生活”和“重积累、轻消费”的错误思想的影响，广大西部地区城乡生产与生活服务设施严重短缺，第三产业十分落后，给人们本来已很单调的物质生活带来更大的不便，进而极大地恶化本来就很恶劣的人文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以后，广大西部人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人们手中有了钱，但却很难买到称心如意的消费品。地方政府囿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一时难以迅速改变第三产业的落后状况。这是西部发展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东胜城市发展的特殊条件，又使这一问题显得更为尖锐。

东胜刚解放时只是一个村庄，69户，389人。三家杂货店和两家小饭馆构成它的全部第三产业。1950年，这里成为县政府所在地，盟政府和党委也相继迁来，东胜作为政治中心迅速发展。70年代以来盟里发展的一些工业，大多放在东胜。1978年，东胜市区工业总产值4326.78万元，非农业人口37738人。到1986年，工业总产值达10134.3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增长1.33倍，非农业人口62722人，增长66.20%。

东胜作为伊盟唯一的城市，还担负着为广大农牧地区140多万人服务的功能。经济体制改革和党的民族政策给高原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变化。1986年全盟农牧业总产值达31480万元（1980年不变价格），比1978年的16908万元增长了86.18%。农牧民的人均收入412元，与全国水平接近。其中牧民人均收入636元，远远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从理论上说，第一、二、三产业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结构。农牧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对生活有了较高的要求，需要城市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工业品。手里有了钱，他们也常进城开开眼界，买上一些乡下难以买着的東西。相当数量的购买力流入城市，形成一股压力。城市工业的发展，市区居民的迅速增加，要求城市在吃、穿、用、娱乐等方面提供服务。两股力量加在一起，客观上要求第三产业必须紧紧跟上。

对西部地区来说，第三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意义。人们的生存不仅要有适当的自然环境，还需要有适当的社会环境。第三产业直接与人们的生产紧密相关，构成人们生存不可少的社会条件。西部在人们眼里之所以艰苦，除土地、气候等自然生态上的原因外，也有经济、社会等人文生态上的原因。发展第三产业，优化西部人文生态，是减小东西部差别，增强西部吸引力的重要手段，因为优越的人文生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自然生态的不足。在难以改变自然生态的情况下，改变人文生态就显得更为必要。

东胜产业结构的失衡，第三产业的短缺，给人民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这形成一个产业空白地带。为江南农民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土壤。市场规律在这里起着作用，供不应求，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看不见的手，推动江南农民到塞北来。而他们的到来，又确实起到了人们所期望的作用，推动了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

江南人起到一种新文化载体的作用。他们来自发达地区，直接把那里一些新颖而有吸引力的东西带来了。他们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打破了国营商业死板的面孔；他们的货物花样繁多，国营商店里难以见到；他们的饭菜小吃别有风味；他们的手艺——木工、钉鞋、裁缝

——又都比当地匠人高明。因此受到人们的欢迎。

这些变化，是每个市民都可以感受到的。然而在这显而易见的变化底下，还默默地发生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不直接创造任何财富，但它的力量却改变着劳动者本身，促使他们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一是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伊盟地区长期来自给自足的农牧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十分落后。直到解放前夕，这一带仍通行古老的以物易物交换方式。在自然经济土壤上产生的轻商思想，长期束缚着人们的观念和经济行为。

江南个体户的到来，大大改变了东胜人的看法。人们亲眼看见，这种“低贱”的劳动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仅从东胜市邮局统计，他们每年就有80万元汇往江、浙老家。也就是说，每户平均约2500元。这还没算上他们随身带回家乡的款项。人们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过去所鄙视的行业，从新的角度去思索过去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江南人的成功起到一种示范效应，吸引人们追随模仿。有拜师学艺的，有合作经营的，也有自立门户的，越来越多的东胜人干起这些过去看不上眼的行当。

二是促进竞争。旧经济体制下企业养成的官商作风。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卖方控制买方，企业无竞争压力，长期满足于落后状态，改革在体制上为改变这种状况提供了可能性，而来自个体经济的强烈冲击，又促进了可能向现实的转变。外来个体户收入和他们的经营状况直接相关。“快、新、勤”是他们的经营方针。他们不但尽力适应消费者的口味，还用五光十色的新商品刺激消费者新需要的产生。这对当地商业、饮食、服务业都形成严峻的挑战。国营商业不得不考虑如何改善经营来应付新局面。

经济发展远远不单纯是经济问题，它还与社会和文化因素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西方社会学对不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传统文化的束缚，是妨碍发展中国家迈向现代化的重要障碍，这种植根在人们灵魂深处的传统观念和行为规范，常常在背后不知不觉地制约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我国东西部的差异，不仅表现为经济水平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的差异。实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优化西部的文化，是西部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条件。

从理论上说，当先进的中心文化以人流、物流、信息流为载体，向一些不发达地区传播，撞击落后的边陲文化的时候，它就能强烈地刺激那里的人们对现代文明的强烈欲望和向往，从而也就构成了先进的中心文化对落后的边陲文化的强烈的示范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对先进文化的模仿和攀比，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由现代文化所触发的模仿和攀比，是文化、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在驱动力，它的最终结果是使边陲文化整合于中心文化，是边陲文化的更新与发展。这些远道而来的江南农民，不知不觉地在担负着文化传播中“盗火者”的使命。

三 新的人口迁移模式

西部人口迁移问题，从解放起就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1949年西北野战军进军新疆。新疆和平解放后，部队就地放下枪杆，开荒种田，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主要是考虑到西北边境人烟稀少，不利国防。于是采取历史上行之有效的办法，屯兵实边，平时靠生产养兵，战时可及时动员足够的兵源。这种军事移民方式，目的完全在于国防建设。

50年代起，大西北的生产建设有了很大发展。1950年铁道部成立西北干线工程局，着手修建天兰铁路。至今西北已形成3400公里的铁路线。“一五”时期国家156个重点项目，有

不少摆在西北，大三线建设时期，陕西、甘肃是重点之一。35年来，国家在西北投入大量资金，形成上千亿的固定资产，奠定了西北经济建设的基础。

随着建设的需要，国家采取各种方式，动员和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建设大军，一批批地输送到西部。这些西部建设者的来源主要是：（1）从沿海城市抽调支援西部重点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生产技术工人；（2）随企业整厂搬迁到西部的职工；（3）历年动员分配到西北工作的大、中专学生；（4）鼓励西部驻军人员就地复员转业，参加工作；（5）动员调配干部，支援西北。

应该说，国家组织的移民是卓有成效的。在短期内迅速动员如此庞大的建设生力军前往西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难以想象的。我国大一统的传统和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社会管理制度，在人力资源的动员和调配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其中主要的两个工具是思想统一和组织约束。

我国用行政办法集中管理劳动的制度，在组织上保证了动员人力的能力。毋庸讳言，来西部的移民并非百分之百的都是出于自己的愿望。但是，一旦计划下来，无论是工作安排也好，调动也好，就必须执行。个人的职业完全由政府规定了，没有选择的自由，抵制行政命令，就意味着失去职业，再无别处谋求工作了，这种组织约束事实上存在，我们不可自欺欺人，视而不见。科学的态度是正视现实，寻求对策。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继续沿用这种人口迁移模式。必须清楚地看到，这种模式是我国在一定历史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建国初期要迅速改变工业落后面貌。必然要借助政权的强力，迅速集中人力、物力于经济建设。只有采取这种自上而下组织的人口迁移，才能保证人口流动与资金流动的协调，保证西部开发的需要。而建国初期全国蒸蒸日上的形势，也为我们减少了人口迁移的阻力。对此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如果我们不把这种模式看作是应急状态，而看作是常规形态，那么，这种模式旋出的人口流动浪潮就会逐渐失去初始的势头，变得效力平平，甚至举步维艰。种种迹象显示出：

——相当一部分在西部的人员，在为开发西部奉献了几十年后，思乡之情越来越强，压抑已久的离愁不时泛上心头。他们一有机会，便千方百计“孔雀东南飞”。事实表明，不可低估千百年来“安土重迁”、“叶落归根”传统观念的顽强性，过分夸大大人们在现阶段的觉悟。

——动员内地或沿海居民到西部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因为人们知道，一旦被纳入这种人口迁移的模式中，就会意味着以后世代代在西部生活。西北地区的恶劣自然环境常使人们望而生畏。有不少大学毕业生宁肯不要文凭，也不服从去西部的分配；有不少干部职工，宁愿辞职不干，也不愿被调往西部。

毋庸讳言，这种模式对人口流动过多地强调计划导向和行政制约，而没充分考虑利益导向；这种模式必须同流动人员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相结合，才能发挥应有的功效；这种模式以社会组织力量为动力，忽略了故乡归属感对流动产生的滞力；这种模式将流动人员固定化，可流动人口的可能数量大幅度减少；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主体被动”，即流动人员受一定强制性制约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主体自动”，即流动人员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的。

必须看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维持这种模式的社会经济基础开始动摇。企业劳动使用政策的放宽，人才流动政策的执行，就业渠道的多样化，打破了过去一成不变的就

业状况，软化了组织约束力，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主体被动”迁移的条件逐步丢失，旧模式难以继续维持。

针对新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除了通过加强思想教育，优化西部生活环境，提高支边人员待遇等办法，使这种模式在新条件下更好地运行外，更重要的是及时总结实践经验，探讨适于新形势的新的人口迁移模式。我们看到，东胜的江南农民以自己朴素思想和直觉，自发地走出一条全新的人口迁移道路。与旧模式对比，江南农民的人口迁移有以下特点：

第一，利益导向。他们是为了赚钱而来。“先吃大苦，后享大福”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他们没有那些“支援边疆，开发西部”的远大理想，只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追求。但无论动机的差异如何巨大，他们事实上干着同样的事业，确确实实对西部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第二，去留自由。他们是自己选择东胜，自愿而来的，没有谁给他们下命令。他们也可以选择别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回去。他们在家乡保留自己的户口，有自己合理合法的生活位置。即使几年甚至几十年不回去，也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

事实表明，江南农民创造的人口流动模式有几个不容忽视的优点：（1）可以保证合乎地方需要的人员流入。（2）流动人口来西部是为工作而不是为生活，没有生活顾虑和生活负担，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可集中于工作。（3）人口流动有助于打破西部的封闭状态，加强东西部交流，帮助西部尽快吸收东部的技术、管理方式和文化。

目前这种流动式人口迁移模式仅仅是初创，它起作用的范围十分有限，只是对旧模式起补充作用。然而不能因为当前的状况就断定将来也只能如此。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旧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新模式近年却发展很快，只要我们及时总结经验，提出得当的措施，微小的萌芽很有可能成长为茁壮的大树，在未来的西部人口迁移中占有一定地位。

可能有人担心，这种保持去留自由的流动人口不是真正的移民。他们虽然对西部发展作出一定贡献，但不能成为西部的社会基础，一旦风吹草动，全流回老家，整个西部社会就会面临崩溃。因此，这种流动式人口迁移模式是不可取的。

且不说大规模的同步回流事实上是否会发生，一般说来，只要政策没有大的变动，人口流动的大波折也不会有。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希望西部能保持稳定的移民。恰恰是去留自由，才能保证这一点。没有去留自由，农民是不会象今天这么踊跃来闯西北的。固定式的人口迁移似乎能维持西部移民。但失去流动自由，人们对此顾虑重重，移民从何而来？流动虽然允许人们流出，但同时又为更多的人解除顾虑，吸引他们流入西部，在这种流入流出相抵消的动态过程中，西部移民总量是可以维持的。

四 启示与展望

这些远道而来的江南农民，在简单的赚钱动机驱使下产生的迁流行为，创造了内涵丰富、意义重大的人口迁移新模式。这一点超出了人们的意识，这毕竟是一件新鲜的事物。它的真正意义，不可能一开始就被认识清楚，需要实践的发展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现实材料。在这种模式处于萌芽的今天，它在事实上只表现出不很显眼的价值：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微不足道的传统小手艺，低层次的产业，虽然是西部所急需的。但它并不能构成西部未来发展的主体力量。

西部未来主要是依托其丰富的矿物资源发展。在我国东部矿产相对缺乏，过量开采已造成严重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西部的资源开发对国家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目前西部的资源由于交通条件、资金和人力的不足，大多仍处于沉睡状态。投入适当的人力、物力开发西

专业不对口，再好的报酬也不会有吸引力的。引进人才首先已给了他们认为满意的职位，也给了他们做出业绩取得高额报酬的机会。这已经有足够的吸引力了。至于说来了做不出成绩，得不到高额报酬，也是自己的责任，不会有怨言的。

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吸引力。青年人特别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大多有干一番事业的心理。人才济济的大城市使他们感到受压抑，大才小用，难展抱负，因此希望到人才较缺的地方去，一展自己的才能。这种吸引力是不可低估的。现在的问题是政策不当，使年青人及他们的家长顾虑过多，不敢贸然行事，抵消了西部的吸引力。

——给予和保持去留自由，是促进人口流动的关键。在长期土地束缚下的农民是不可能流入西部的。谁外出谋生，不参加队里劳动，就会被批为“资本主义”。改革给予农民更大的力量，使之摆脱了束缚，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求新的机会。他们获得了离开土地的自由。这种人身依附的摆脱，应该是为城市职工所羡慕的。我国企业长期以来实行人员单位所有制。外面的进不来，进来的出不去，依附于单位。虽然已有停薪留职的制度，但这是对一般职工而言，对专门人才难以实现。单位领导对停薪留职有审批权，要卡要放，大权在握。

更重要的在于迁回原地的自由。我国的社会格局，总的来说是流动性很小。西部由于人才缺乏，对人口的流出控制更严，这种状况一时还改变不了。但应该对各种人口有区别地对待。西部要想吸引东部的人才不能是单向阀门，只能进不能出，把退路堵死，而应该打开通道，进出自由一些，才能收到好的效果。为避免原有人才的流失，以后可采取新人新制度、老人老制度的有区别的政策。对支援西部的各种人才，各单位应积极允许停薪留职，城市保留户口，妥善解决他们家属子女工作、学习、生活上的具体问题。东部城市各级领导应发扬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把这作为政策性很强的大事对待。对于前往西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应保留他们一定年限后返回重新分配的权利。由学校所在城市保留他们的户口。

劳动人事部门应当为此开绿灯，做好服务工作。建立集中的人才资料库，了解人才的供需情况，为西部引进人才挂勾搭桥。运用合同制和轮换制，一方面解决支边人员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保证西部能得到所需人才。

广泛开展东西部横向经济联合，十分有利于人才流动。在东胜我们看到这样的例子。无论是以资金为纽带还是以原料供应为纽带的联合，双方企业有共同的利益连带关系，互通有无，可以促使技术力量较强的企业把技术人员派往西部短期工作，解决一些技术难题。这样的人才流动，企业双方都有积极性，阻力很小。而且针对性强，引入的人才可以迅速发挥作用。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上接第56页）

保证人口再生产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良性发展。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改变少数民族的一些落后的婚姻习俗和生育行为（但这首先应从调查研究入手），制定具体政策时要因民族制宜，要慎重，要考虑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承受能力。从近年来随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与外族通婚比例提高的可喜现象中，我们看到了妨碍我国少数民族人口健康发展的近亲婚配落后习俗松动的趋势，看到了逐步建立民族地区新型婚育模式的前景。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